

职域建党:革命时期的产业支部与城市动员

——以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例

李威利 张翔

内容提要 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是中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组织基础。1925年中共四大以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本上有两种组织类型:产业支部和区域支部。相较于区域支部,产业支部主要集中在城市场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形式。在后续党的组织工作中,产业支部的建党要求逐步推广为在其他职业领域中的职业支部建设模式,并对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化和国家组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1938—1949年期间上海租界的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案例,阐述城市中产业支部建设的组织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产业支部在政党、社会、国家组织化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关键词 民主集中制 产业支部 职域建党 组织策略

李威利,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0433

张翔,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350007

一、引言

“组织化”是中共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也是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基本视角。组织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是中共实现社会动员并推动革命的主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国家立国建政的制度形态。杨光斌等指出,党的这种制度结构概括起来就是“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集中制,党才能够将整个国家有效地、合宜地组织起来^[1]。陈明明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这一制度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支配性的组织和力量,从而把政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并决定了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2]。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党建的经验与规律研究”(18JJD710020)、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项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2017EKS005)阶段性成果。

[1]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北京〕《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

[2]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民主集中制”在组织维度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密切相关。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以及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都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出组织上的原则，要求所属国家政党既要接近群众、学习群众，同时又建立“严密整齐，安排妥善和机动灵活”的党组织^[1]。因此，支部开始明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组织的基础。任弼时在1925年撰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指出：“支部组织乃为接近群众的基本组织方法，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团体组织上与其他假称革命政党在组织上不同的地方。”^[2]在这一基本认识下，1925年以后，中共先后召开党的四大、中央执委会二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以“支部”为党的基础组织，要求“一切工作归支部”，以支部为基础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从而使党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性和集中型的政党^[3]。

支部不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扩大了党的组织规模，不同时期党支部建设的策略、类型和特点还对党的整体组织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支部发展的组织策略和微观机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支部对政党和国家体制发展的重要意义。

支部组织的发展首先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应星指出，在中共早期组织形态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学校和地缘”作为两种特殊的社会网络是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一方面是通过学校嵌入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之中，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缘关系嵌入传统的社会关系之中^[4]。黄道炫通过对甘肃徽县等革命边缘地区地下党的研究，认为地方性的特殊环境和关系网络对建党有偶然性有利作用^[5]。除特定的关系网络外，传统社会关系的影响也特别重要，应星和李夏的研究认为，革命行动并不会将传统社会既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冲突因素割裂开来，而是以这种社会网络为组织基础，并将传统的社会冲突裹挟进来^[6]。王奇生注意到基层党组织常常通过邻里关系吸收同志，并且还通过诸如结拜把兄弟、开教馆（私塾）、教拳头、旧式行会、同乡团体和秘密结社等传统社会媒介去发展组织；而在农村中，党员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亲友、近邻和同村村民中借助于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发展组织^[7]。黄文治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早期政党下乡的革命动员在乡村社会采用的多是“日常行为轨制”，包括“串亲戚”“交朋友”“谈天”“唱山歌”等方式。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在政党力量较强的地方，中共可以改造传统社会关系来重建政治认同。例如在苏维埃政权中，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会通过紧缩分割的方式切割乡村宗族、血缘、地缘等地方传统的各种文化网络，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分门别类地按照人口、性别及阶级成分来进行重新整顿，使每一个非敌人的农民都有一个或多个革命组织统一的身份^[8]。

支部建设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还明显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环境的制约。在早期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基层党组织广泛存在着“拉夫式地吸收同志”，党员中也多有雇佣革命的倾向和“入党谋生”的动机^[9]。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满洲地区，尽管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快速扩大党的组织，但仍然出现党

[1] 刘建萍：《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思想与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页。

[3] 陈毓述：《陈独秀与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 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5] 黄道炫：《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北京]《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6] 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上海]《社会》2014年第5期。

[7] [9] 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8] 黄文治：《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广州]《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员人数少、力量薄弱、人才匮乏,支部缺乏党的生活、组织散漫、纪律松弛,特别是经费短缺常常使党组织出现“山穷水尽”的状况^[1]。在中共已经掌握政权的地区,基层组织的建设往往能够得到政权支持,从而许多地方建党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特征。王莲花对苏维埃政权内的组织动员系统的研究指出,县乡政权组织发挥了革命动员的关键作用,党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各种互助合作团体在参战支前和生产管理方面的意义重大^[2]。罗平汉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支部建设的研究指出,在华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支部建设体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主要是通过军队支持下的工作团和工作队大规模地开展动员和发展组织^[3]。

尽管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支部建设的效果有明显差异,但中共基层组织的建设仍然遵循着一些一般性机制。首先,支部常常通过与既有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来获得发展。王才友的研究指出,1925年以后中共基层党组织发展实际上遵循“由社入会”进而“由会入党”的组织发展机制^[4]。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工青妇、雇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妇女会等党领导的各种工农群众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媒介作用。其次,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中共倾向于通过整体性组织规划,构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权力组织网络”。李里峰对乡村动员的研究指出,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共逐步在基层乡村社会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绝大多数村庄和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设立了党支部/党小组,以及其他科层组织、阶级组织和武装组织^[5]。满永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建党的研究指出,基层支部的建设不仅仅有工作团和工作队,同时还有具体的发展规划,按照“一乡一支部”的标准在农业社普遍建立了党组织^[6]。再次,在具体的动员机制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发展也可以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的策略和方法。李里峰对中共乡村动员的研究,指出了基层党组织在动员过程中利益、身份和情感三个关键机制,对三方面策略和技术的交叉运用构成了中共乡村动员的基本模式,并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乡村社会获得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7]。裴宜理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指出,党组织在城市中的动员明显地受到地缘关系、文化网络、党派关系和产业政治的影响^[8]。

不过,既有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城市和农村生产生活模式的不同,中共在城市和农村两大场域中的基层组织实际上遵循不同的组织逻辑。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革命动员的主要成果也在农村,因此既有研究多重视农村地区的动员模式,而忽略了城市支部对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党的支部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类型未被重视,即产业支部。党在城市中对产业支部建设的探索,不仅对革命时期的乡村动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政权的建政模式和组织体制。本文从对产业支部的探讨出发,来呈现中共在城市中的组织逻辑、组织策略和基层组织形态。

[1]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1927—1933年)组织生态分析》,〔北京〕《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2]王莲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动员组织系统》,《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3]罗平汉:《抗战前期华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与整顿》,〔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4]王才友:《由“社”入“会”: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1925—1934)》,〔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5]李里峰:《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满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建党: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

[7]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8]〔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二、从产业支部到职业支部：城市场域中的基层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特别注重对城市产业工人的组织和动员。“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1]早期中共对产业工人的动员主要通过工会组织来进行。“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去组织大工会。这种大工会的基本组织就是工会小组,这种小组应按照每个工厂内的各部分去组织。”^[2]

不过,1925年的中共四大是一个重要转折,在共产国际和国共合作形势发展的影响下,中共开始强调支部是“战斗堡垒”和“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会必须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与影响之下。到1926年,中共已经开始明确地提出建立党的产业支部的要求。所谓产业支部,即党支部建设的基本单元为产业和工厂。“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产业支部作为一种基层党组织的类型由此得以明确。“只许有两种性质之支部存在:(甲)工厂支部,农村支部,或学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区域支部(即按居住址而分划)。”^[3]换言之,支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产业范围为界限,即产业支部,包括学校支部、店员支部、工厂支部等;另一种以地区范围为界限,即区域支部,主要包括街道支部和农村支部。

在产业支部和区域支部之间,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建设强调以产业支部为主体。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4]。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改章程决议案》,将生产单位作为党的组织系统的基本单元,同时要求:“在多量党员产业生产部门中,可组织分部,……支分部之下亦得组织小组。”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中,又将支部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工厂支部、街道支部和农村支部(协会支部和村支部)^[5]。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城市工作处于发展的低潮。但即便在相对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中共仍然始终强调产业支部的重要性。其在1930年的《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要求,“已有支部的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企业,党应积极扩大支部的组织,尤其注意到该工厂或产业的重要部门的发展,多吸收新的斗争分子,来加强支部的力量,改造党的旧基础。没有支部的工厂或企业,必须在此两月中把支部建立起来”^[6]。

在这一时期的产业支部建设方面,中共逐渐明确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支部建设要与生产单位相结合,党的组织要在生产单位中开展活动。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批评了党组织缺乏在“工厂作坊内”活动和建立组织的现象。“过去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得不到党的领导,在有些罢工中党的领导失败……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党缺乏在工厂作坊内的活动。”中央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新的要求是,“必须将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心放到厂内活动上去,这首先就要建立经常的支部生活……使党的一切活动的重心,由厂外转到厂内,由上级转到支部中来”^[7]。1939年,刘少奇在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第65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81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727页。

[6][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第486—487页。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对这一经验做了总结,他把民众的组织分为七类:产业组织、职业组织、地域组织、年龄组织、性别组织、阶级组织、信仰组织。在这七类组织中,“产业组织与职业组织,是组织民众最主要的方式”^[1]。

第二,产业支部的建设必须要“打进生产”,紧密结合和把握企业中的重要部门。193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要求“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握住主要的工人重心,特别是重要的企业及这些企业中的主要部门”。在具体方式上,“在主要企业内要利用一切群众的斗争来组织车间代表会议、斗争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等,务期在党的组织周围有广大群众组织环绕着,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2]。1933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产业支部的现状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一旦支部没有完全握住厂内重要部门,支部就会“一般微弱”。具体组织方法上:一是民主选举出支委会;二是根据生产部门成立党的小组;三是支部同志必须进行精细分工,各负其责;四是支部工会干事和工会积极分子组成工会党团小组;五是支部委员会、干事会、各小组、各党团应该整个生活在工厂内,利用厂内实践,经常接头或举行短时的会议,传达党的指示,解决厂内日常发生的问题^[3]。

随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策略的推进和抗日战争的深入,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日益重要。我们发现,即便是在农村,在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方面,过去的城市经验也得到一定继承和发展。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根据地公营工厂内建立工会,建设工农青妇联合组织,并实行群众运动领导一元化。在组织方式上,农村的特殊情况可以将零散工人编入一般民众组织内,而工人集中的乡村可单独成立小组。由于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有一定的统制经济特征,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仅仅与工厂相结合,而且与各种经济文化机关相结合。“干部尽可能的打入各经济文化机关,不脱离生产,从自己职务中去建立与群众的联系。”^[4]

虽然经历了工作重心从城市到乡村的转变,但党进行城市产业支部建设的基本经验始终没有中断。1944年,当中共重新提出唤起对城市工作的重视,并准备去“夺取大城市”时,过去城市产业支部建设经验立即重新得到党的重视。1945年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对此做了精辟总结:“党的基础组织,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建立党的堡垒,这是必须遵守的党的一个组织原则。”^[5]

不过,当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回城市时,在多年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以工厂等生产单位为界限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和原则,已逐步扩展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各类职业单位。换言之,产业支部的建设实际上由以生产单位为主,发展为涵盖所有城市职业组织在内。因此,工厂支部逐渐演化成为职业支部,产业建党逐渐发展为职业建党。对此,七大修改的《党章》进行了系统阐述:党的组织“是按照地区或按照生产部门为标准建设起来的。在一个地区内,管理全区党的组织,对于该地区内各个部分的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在某一生产部门内,管理全部门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部门的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七大《党章》重提了按居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4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3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304、308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448页。

住位置和按生产单位两种组织方法,对二者既有区分也有结合运用。“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得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允许,得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1]

从产业工会运动,到产业支部建设,再到职业支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支部建设的传统和经验,实际上还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权建设,成为城市建政的重要原则。1951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指出,“这些党员,在全国各方面建立了约二十五万个基层组织——支部”。“我们的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地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使我们党具有充分广大的群众性。”^[2]至此,以职业支部为基础的党建模式基本形成,成为我党城市党建工作的重要经验。

三、职域建党的组织策略：以1938—1949年中共上海电话支部为例

在城市中,无论是产业支部还是职业支部,都具有明显的职域建党特征。所谓“职域建党”,就是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每一个职业单位中去,使党的组织以工厂、企业、职业部门为范围开展活动。职域建党具有三个方面的典型特点:第一,党的组织发展以工厂、学校、机关等职业组织为基本单元;第二,党的组织嵌入职业组织,在职业组织内部开展活动,逐级嵌入部门、车间、班组;第三,党组织的发展动员依赖于职工之间的职业联系。本文以1949年前上海电话公司的中共支部建设为例,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产业部门中建设职业支部的动员策略。

上海电话公司是一个外商在租界专营的电信部门,其前身为华洋德律风公司,1899年创立,于1908年取得了全部租界区内的电话专营权;到1926年,拥有中央、西区、北区、东区、路联局等五个交换所和虹桥分交换所。1930年,该公司产权为美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取得,改称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有电话用户约四千八百余户^[3]。抗日战争时期,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统由日伪华中电气通讯公司管辖。1944年,在日军管理下,上海电话公司与上海电信局合并,改称为“上海电话总局”^[4]。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接收了敌伪华中电气通讯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原属四机构被划分为上海国际电台(包括国际通信及上海海岸电台)和上海电信局(包括国内电报、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两大机构;同时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产权返还给美商经营^[5]。

1925年开始,党的力量已开始逐步影响华洋德律风公司的工人运动。五卅运动期间,由于公司接线员唐良生在南京路遭英巡捕开枪打死,华洋德律风公司爆发了工人罢工运动。罢工运动由公司中第一个共产党员王西庚领导,上海电话工会在工人运动中成立。1927年以后,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损失惨重。据统计,1930年上海属于中共领导下的赤色工会有工人近2000人,到1932年下降到500人,到1934年时,已所剩无几^[6]。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工人运动也趋于沉寂。不过到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共在上海成立江苏省委,同时决定按照不同系统设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545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3][5]《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第61页。

[4]《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6][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置工人运动委员会、职员运动委员会等垂直单线负责的党的领导机构,开始重建纱厂、印刷、码头、电讯、邮政等各行业党团支部,发展党的组织^[1]。1937年11月,随着日军入侵上海和国民党撤离淞沪,中共在上海重建工人阶级党团组织获得了更好的机会^[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上话路联局孙茂华、梁修智、洪茂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上话支部。

中共上话支部建立之初,在开展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方面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当时党支部仅限于路联局,并且仅在话务部门。而上话公司分为八个局和一个附属局,职工比较分散,不方便联络。二是资方常常采用分化政策,严禁职工之间的往来活动,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动辄罚薪或停职。三是在上话公司不同年龄的职工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隔阂。公司中有41.2%的职工是超过15年工龄的老职工,他们工资和福利待遇较好,革命行动不积极;而青年技术人员和普通青年职工的待遇较低,革命的热情高涨。四是男女职工之间也存在隔阂。话务部女职工居多数,而工务部男职工居多数,男女职工生活习惯的差异,使得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也比较困难^[3]。

在这样的基本形势下,党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内部的政治动员和基层组织建设却在较短时间之内取得成绩。自1938年至1949年,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除少数战时外,党的组织基本上持续存在,工会组织体系遍布产业部门,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1945年11月,中共在上海成立“六大公共事业工会联谊会”,联谊会由上海电话公司工会与上海电力公司、法商电车公司、英商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管的工会组织联合组成^[4]。上海电话公司在工人运动中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与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系统性组织策略密切相关。这一策略包括“发展积极分子—建立生活联系—发展兴趣组织—建立工会—最终党的组织进入各产业部门”等不同环节。

1. 以积极分子为根本依靠 在党的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往往是由个别党员的努力工作打开局面的。上海电话公司在一九二五年的大罢工由共产党员王西庚领导发起,罢工以后其最早在上话公司开始了党的活动。1938年,在国内抗日运动和爱国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中共上话支部的重建,也是通过路联局孙茂华等积极分子的努力工作完成的。党支部在群众工作中特别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团结和发展积极分子。1945年,在重建工会的工作中,党支部首先召集二十多位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组织工会问题,并在会上推定党员起草一份《组织职工会缘起》并油印下发,为重建工会奠定了基础^[5]。积极分子同时还是发展党员的重要对象,同行业的上海电信局在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6]。这一机制并非仅是个案,我们在天津邮工运动历史资料中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几个地下党员周围还有一些赤色群众或党的同情者,他们支持着、掩护着党员进行各种斗争……这些人,解放后多数成为各项工作的领导骨干。在解放前,如果按敌友划分,这些人应算作‘我’。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友’,经过争取,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能够与我们站在一起。”^[7]

2. 分类分层组织动员 在实际工作中,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明确以组织动员作为支部的中心工作。在具体措施上,首先是在职工中间进行人员的分类。当时分成:进步(有爱国热情、正义感的)、积极(敢于反抗监督压迫的)、基本群众(同情我们并能团结在我们周围的)、顽固(对我们采取敌视或

[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三卷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3—964页。

[2][4][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第167页。

[3][5]《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第12、46、78页。

[6]《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7]天津邮政公司编:《天津邮工运动史料(第二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

不理睬态度的)、保守(表面上尚能搭讪但遇事敷衍的)、腐化(专门搞女人跑跳舞场或嗜赌的)、走狗(专门在外国人面前讨好“触人家壁脚”的)、中外监督(谁最凶、谁比谁好)、国民党等九种类型。在初步了解人员情况的前提下,党在支部的工作中区别了发展对象、团结对象、孤立对象,然后分工划分对象并进行工作^[1]。同行业的天津邮工运动资料也显示出同样的机制,据当时的党支部负责人回忆:“刘铁与我接头时,有一个永恒的谈论主题,那就是具体分析邮局里的人,明确该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他还对我说,联系群众要眼睛向下,突破小职员这个圈圈,要到基层邮工中去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积极分子。”^[2]

3. 排忧解难与“结交朋友” 支部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总结分析不同群体的工人在实际工作中的各类困难,并积极寻找办法解决。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对于接线员等职工在每天工作中茶水供应不够的问题,党支部一方面团结较为进步的老同志要求资方增加开水供应,另一方面组织群众自己出钱购置茶叶和器具,并按期公布账目。在此基础上,党支部还利用购置茶叶结余下来的钱订阅两份报纸,放在休息室。“这就使休息室成为了党支部的宣传工作阵地。”中共上话支部还帮助解决工作午饭问题。“按照公司规定接线生吃午饭只可带熟饭来热,不得带生米来煮。这在天冷的时候还不要紧,一到夏天就成为‘吃饭问题’了……党支部也抓住这个群众最关心的困难问题,发动群众要求公司答应生米煮饭。”还有孕期哺乳等问题,支部“为了女同志的特殊利益,特别是怀孕和有婴孩哺乳的,向资方提出要求让她们先回家,在封锁期内要减少她们的工作,这些也为资方所接受”^[3]。“广交朋友”是当时城市党支部动员工作中的主要口号,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直接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朋友”的“三勤”口号^[4]。“先从感情上着手,在建立了一定的优异基础后,再从日常生活、家庭情况等谈到时局方面去。交朋友的主要方法是在生活上加以照顾,如下了班一起回家,或者是看电影、游公园、聚餐、搓麻将,总之根据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广交朋友”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努力为工人提供各类生活支持。在1940年以后,党支部在结交朋友方面做的工作是比较彻底的。当时每遇同事中有人结婚或是家中有丧事,从账房、司仪、招待一直到打杂都是党员发动积极分子包下来。遇有职工家里突遭变故或是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党支部就率先发动群众捐助^[5]。

4. 组织各类工人兴趣组织 党支部在组织动员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放手发展工人兴趣组织。在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工人解决茶水困难的过程中,就首先出现了工人自组织,即茶水组,专门负责茶叶购买、茶水供应等问题。除此之外,各种类型的兴趣类自组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广泛存在。中共上话支部在青年工人中组织体育组,开展打篮球、踢小型足球等活动。党支部还组织了“进修读书会”,当时读书会学习的是“大众哲学”。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党支部还设立了图书馆;图书馆的书是在群众中募集的,其中以新文艺、译文、社会科学的书最多,以《西行漫记》和《家》流动最广。1941年日本向英美开战进占租界以后,党支部领导的公开性群众活动大多都暂时停止。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上话党支部仍根据当时上海话剧比较活跃和流行以及青年职工兴趣很高的特点,组织了“荧光”

[1][3][5]《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第49、50、57、60页,第64页。

[2]《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307页。

[4]《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业余剧团^[1]。剧团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80多人。剧团开办各种训练班和讲座,如国语班、技术 Research 班、歌唱班、导演训练班、表演技术座谈等,也开展各种针对剧本和集体看戏后的座谈会。剧团内设有图书馆、墙报和运动组。在此基础上,党支部派一部分同志在剧团内联系一批非党同志经常讨论时事^[2]。事实上,工人兴趣类组织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天津邮工运动中的党组织负责人在回忆党的工作时坦言,“所谓学习会,其实有实无名,‘会’是会面的‘会’,而不是会议的‘会’”^[3]。

5. 工会与支部一体两面 在中共上话支部的活动中,工会工作和支部工作往往是党的组织动员的一体两面。上海电话公司最早成立的党支部是就是依托工会建立起来的。1925年6月5日,上海电话工会正式成立。电话工会在组织体制上以部门和自动机车间为单位,在各个部门和自动机车间设有工会小组,通过这种方式将党的影响在各部门扩展开来。也正是通过工会,发展成立了最早的党支部^[4]。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会等合法组织尤为重要:“必须善于运用各种‘合法组织’,并从中取得阵地,团结和教育群众,积聚力量,待时机展开斗争,就能进一步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迅速提高党的威信,使斗争易于取得胜利。”^[5]因此,中共上话支部认识到,在赤色工会不能建立的地方,甚至要利用黄色工会的组织开展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支部在群众工作中率先提出重建工会的政治要求。1946年4月13日,上海电话公司工会正式重建,工会的各部门监事候选人按照部门人数和部门代表比例来确定^[6],工会按照工资千分之五收取会费^[7]。

四、以“组织嵌入”促城市动员:中国共产党城市建党的基本模式

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产业支部建设经验,我们发现,党在城市中的政治动员和支部建设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党的组织总是通过嵌入其他组织来获得自身的发展。王才友的研究指出,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中共往往是先建立工农群众组织,而后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并逐步发展起正式的基层党组织。不仅如此,在工农群众组织薄弱的地方,党组织还通过建立兴趣组织的方法加强工人之间的联系。裴宜理指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工作首选通过救国会来发展,与此同时,中共还帮助小茶馆和救国会各团体改头换面为各种俱乐部和互助社^[8]。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产业支部的建设具有很强的“嵌入性”特征,党的组织不仅嵌入兴趣组织和群众组织之中,同时也嵌入产业过程和各个产业部门中。

1. 党组织嵌入工会等群众组织 在革命时期,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和动员工人。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时期早期党组织自身的三大特点,使得党的群众工作不得不通过工青妇等团组织展开。第一,在党的组织还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群众工作更加依赖于工青妇等组织来开展。在革命时期,工会本身的政治属性强而党派属性弱的特点,使得工会相对于政党组织更容易获得

[1]“荧光”业余剧团是中央局的几位职工和路联局的非党同志胡任民等发起的,但中共上话支部也很重视并积极领导了这一组织和相关活动。

[2][4]《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第13页。

[3]天津邮政公司编:《天津邮工运动史料(第二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5]《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6]当时还有代表主张各部门等额分配监事候选人。《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7]按当时《劳工法》规定,工会会费按照百分之二收取,因此上海电话公司工会会费实际执行的比例较低。

[8][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合法地位。党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活动就多次强调利用合法组织的必要性。第二，在党的组织还比较弱小时，工会更容易获得工人的政治支持。工会本身具有的产业联合属性，使得工会组织更容易获得产业工人的政治认同，党组织通过工人开展活动，也更容易在斗争中获得产业工人的行动支持。第三，在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时，工会组织体系是党的组织体系的母体。由于工会组织体系也依据产业和部门为单位组建，因此当企业中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时，党组织可以依托工会快速地在产业和部门中延伸自身的组织体系。除工会外，党组织也常常以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等外围组织为基础来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2. 党组织嵌入各类兴趣组织 在生产单位中没有工会组织，或者是工会组织不能为党支部提供有效组织支持时，党组织该如何能够有效进行组织动员和组织拓展？从中共上海支部的动员过程来看，党员和积极分子可以通过创设兴趣组织的方式加强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兴趣组织类似于今天的社会自组织，它包括读书会、自办报刊、体育组、剧团等多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旨在提升工人教育水平的读书会和各类文娱类组织是最常见的。兴趣类自组织的作用和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工人自组织，企业中的党员和党组织将职工有效地组织和联络起来；第二，由于工人自组织以兴趣聚合为基础，因此通过兴趣组织的形式，使得民主集中制政党的政治动员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同时还有自下而上的维度。两类动员方式和组织策略的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从社会底层中获得有效政治支持，从而极大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效能。

3. 党组织嵌入产业过程和产业部门 产业支部和职业支部的鲜明的特征是支部建设以产业和部门为基础单元。事实上，在工会组织的建设中共也强调了同样的原则。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规定：“每一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1]在如何组织工会的问题上，其基本原则也是强调优先考虑产业组合。当时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认为，“作为一个阶级，工人们绝不要分地域，绝不要分党派，只要是赚工钱的工友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按产业组织起来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产业总工会……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2]。这种产业部门组织工会的机制后来也成为职业支部建设的主要机制。1930年，上海电话公司的工务部各单位，特别是各个自动机车间都有赤色工会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党的小组^[3]。1938年中共上海电话支部成立后，仍然进一步通过各车间、各单位的产业联系发展党的组织。同行业的上海电信局支部也是如此：“党的力量首先必须在主要的生产部门中去生根和发展，这是因为主要生产部门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就按照了上级党所指示方向，在局、台的报务员、报差中建立和发展了党，并在这些部门中生下了根，因而也就保证了党领导的各个斗争的胜利。”^[4]

4. 党的活动嵌入工人日常生活 “嵌入性”特征使得党的动员工作并非总是以政治为先导，在许多情况下，中共对工人阶级的动员策略不是激烈的政治行动主义，而是“和风细雨”的生活主义。在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发展的过程中，党支部明确动员的基础策略是结交朋友，而“交朋友”的基础是为工人和职工排忧解难。在这一过程中，党支部开展的大量工作是活动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这些活动

[1] 文侃：《共产国际：“毛泽东在安源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研究》，载于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页。

[2]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3] 《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4] 《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帮扶性的,包括为有丧葬事需处理的困难职工提供帮助等;第二类是公益性的,包括提供茶水等;第三类是兴趣性的,包括读书活动、体育活动、观影活动等;第四类是权益性的,包括争取福利、组织罢工等。党支部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政治动员以关注群众的生活需求为基础。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的经验表明,即便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年代,党的基层组织也十分重视解决工人的生活需求。第二,党的基层组织不断根据群众需求进行活动创新。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为满足职工需求,采取了各种各样独具特色的活动方式,包括办报刊、建茶水组、组剧团等。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是有创新能力的组织。第三,基层组织的工作创新根据企业和职工特点而定。中共上海电话公司支部在企业中开展政治动员就首先分析了企业特点,同时还对动员对象进行分类,划分敌友。在实际动员策略上,其也采用了一些非常方式。如党组织根据电话公司的实际发起了“磨洋工”运动,“假一老工人住处筹备组织大规模有组织的向用户收取酒钱的工作”等^[1]。

五、余 论

如果说中共早期对产业工人动员的重视主要来自党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立场,那么在1925年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生产单位建党对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四大对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明确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更在于其强调了“一切到工厂去、一切到矿山去”的组织策略。这一策略使得支部建设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为基本单元,形成了党组织嵌入生产单位的职域建党模式。而这一模式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建政和建国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如果比较中共的城市支部和农村支部,会发现党在城市场域和农村场域的组织策略和组织逻辑存在明显不同。城市中由于经济组织、职业组织丰富,党的基层组织形成了工厂支部、学校支部、机关支部等多种形式;农村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党组织主要按照自然地域和行政区域按照乡、村、片等地域单元建党。因此,城市中主要通过业缘建党,农村中主要通过地缘建党;城市中形成了典型的产业支部和职业支部,农村中形成了典型的地域支部和区域支部。当然,这一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城市的手工业者中存在着街道支部,在农村的合作经济部门和公营部门中也存在工厂支部,但在总体上,城市场域和农村场域的中共支部建设明显各有侧重,具有不同的组织模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方针从城市转向农村。在1927至1938年,城市中的支部建设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收缩。但是,产业支部作为一种建党模式却从未中断。1927年红四军在各级军事单位中建立党组织,将党组织兼职附着于基层战斗单位^[2]。这一经验实际上与产业支部建设的精神相一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党支部也建立在公营工厂和根据地经济文化机关之中。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管理城市主要通过“组织化区隔”治理技术,政治运动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分别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继”^[3]。因此,正是通过已有的产业支部和职业支部的党建工作体系,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党治国家的执政体系和党领社会的治理体系。

〔责任编辑:史拴拴〕

[1]《上海电话公司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4页。

[2]彭勃:《组织嵌入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郭为桂:《“组织起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迁》,〔福州〕《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